



元初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初探

申万里

摘要：宋元王朝的更替，使江南士人受到较大的影响，经济情况恶化、社会地位下降以及科举废除、入仕无门，导致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以往南宋时代历史记忆的眷恋，怀旧成为元朝统一之初江南士人群体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南宋时代社会风气的赞美和对南宋时期历史人物的惋惜和怀念。其次是对南宋先贤及其子孙的关注，对元朝政治风气、社会风气特别是对元代士风的批评，以及对儒学、儒士前途的忧虑。最后，江南儒士的怀旧情结还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看似怪异的行为表现出来，元朝一些在江南做官的北人官员也受到影响，加入怀旧群体。元初江南社会怀旧情绪的流行，对于改善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导向，推动了元政权的汉化进程。

关键词：元初；江南士人；怀旧情结

怀旧，就个人来说，意思是怀念往事或故人。就一个社会群体来看，怀旧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怀旧是对过去某一个时代的眷恋与怀忆。古往今来，怀旧作为一种心态，既是个体行为，也是群体行为。本文的怀旧是指一种群体行为，当一个社会群体遭遇生存环境的改变，特别是这个群体在新的环境中处境不利，需要重新适应新环境的时候，这个群体的精神世界之中，就会产生普遍的怀旧情结。

宋元王朝的更替，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化，江南第一次完全处在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的统治之下，“这种异族王朝的统治，对于受过儒学教育的江南士人精英来说，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①。在元朝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族群之中，江南士人属于政治地位最低的南人族群。由于科举的废除，江南士人入仕无门，大部分被迫成为沉浮乡里、流浪江湖的隐士，很多人都需要为生存而奔波。这种处境与南宋时期江南士人的处境相比，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南宋时代的政治、文化精英、国家各级官员以及地方事务组织、策划者，元代沦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人以及被迫为生存而挣扎的地方儒士，这种强烈的反差，在元代江南士人的精神世界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社会现实的不满，通过强烈的怀旧情绪表现出来，成为江南士人精神世界中最重要特征之一。

怀旧作为元初江南士人精神世界的主要特征，客观上反映了进入元朝以后，江南士人的处境或生存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士人的这种怀旧情结，只是对元朝的统治方式以及元朝儒士、儒学的处境表示不满，除了少数南宋遗民坚持反元的立场，大部分江南儒士

^① Jennifer W. Jay, *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ty in the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y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1, p. 7.

并不排斥蒙古统治者和反抗元朝^①。可以说,怀旧情结的流行,对于改善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促进元政权实行汉法,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压力或舆论导向,有利于元朝江南统治的改善和江南社会文化的发展。另外,怀旧也是目前一些社会群体共同的社会心理特征,探讨怀旧的问题对我们今天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是我们了解元代江南士人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只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到目前为止,除了前面谈到的美国学者 Jennifer W. Jay 对宋朝灭亡以后的“忠诚者(loyalists)”的研究,以及 John. D. Longlois, Jr. (兰德彰)对元代金华士人关于忠诚主义(loyalism)观点的研究涉及到江南士人的精神世界(忠诚宋朝的情结)问题,国内主要研究成果是探讨元朝统一之初宋朝遗民的言行和元初士人的政治动向问题,关于元初大部分江南士人精神世界中的怀旧情结,则没有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②。本文将在这方面进行尝试,通过元代江南士人的诗文,考察元代江南士人怀旧情结的表现以及怀旧情结对江南士人日常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怀旧情结对元朝统治的影响。

一、痛苦与快乐:元代江南士人的南宋记忆

宋元更替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化,江南士人群体的衰落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社会现实。这样,在江南士人的诗文中,我们发现了强烈的怀旧情绪,这种怀旧情绪首先表现在对南宋时代往事或人物的回忆,其内容既包含他们在南宋时代的美好记忆,也包含他们对于永远失去这些美好事物的刻骨铭心的苦痛。

首先,南宋灭亡前后的历史事件是元代江南士人不忍谈论却又经常涉及的伤感话题,马廷鸾(字翔仲,曾任宋右丞相兼枢密使)记载了他与汪元量(南宋宫廷乐师)的一次会见:

余在武林,别元量已十年矣。一日,来乐平寻见。予且卧病,强欲一起迎肃,不可得也。家人引元量至榻前,相与坐语,恍如隔世,戚然有所感焉。元量出示《湖山稿》求余为序,展卷读甲子(景定五年,1264)初作,微有汗出;读至丙子(至元十三年,1276)作,潸然泪下;又读至《醉歌》十首,抚席恸哭,不知所云。家人引元量出,予病复作,不能为元量吐一语。^③

这次会见,本来是10年未见的老友聚会,应该是高兴的场面,但由于涉及到南宋灭亡和宋恭帝赵显的北徙,变得异常伤感,主人甚至因此旧病复发。这次伤感的会面反映了前宋官员在宋朝灭亡以后强烈的怀旧情结。

除了食过宋禄的前朝官员以外,一般的江南士人回忆起南宋灭亡时期的往事,也是非常伤感。吴澄读完南宋陆秀夫手稿后写道:“惟公(陆秀夫)不幸值国运之去……一身而备二忠之事,伟哉!王若周以公手稿示予,读之泫然。”^④林景熙在听到南宋时期的同学郭宜孙去世的消息时,有诗写道:

寂寞青灯旧,流离白发新。病犹依故国,死乃见全人。残墨家无子,高风墓有邻。斯文堪一哭,落日冷湖滨。^⑤

这首诗中,既有林景熙对同学去世的苦痛,更有对改朝换代以后,“斯文”丧尽的伤感。即使到了元朝中期,南宋灭亡已经过了30年,回想起宋元更替时期的往事,还是让亲身经历过事变的江南士人很动感情,揭傒斯有诗记载了士人程某回忆往事的情况:

① John D. Langlois, Jr. 就是持这种观点,他认为:“让我们关注元朝中晚期的忠诚主义(loyalism)问题,对前朝的忠诚,并不意味着反抗蒙古统治的思想和行为,绝对不是的!即使在元朝的末年,金华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对蒙古统治的行为,那些加入到朱元璋队伍中的士人,例如宋濂,他的著作里面从来没有透露出反对蒙古统治的看法。”(*Jin-hua Confucianism under the Mongols* (1279-1368) p. 46.) 另外,关于元代金华士人对蒙古统治的态度,John D. Langlois, Jr. 认为,元代士人对蒙古统治有两种态度,一是道不行,不出仕,代表人物为刘因;一是道不行,需要出仕,代表人物为许衡。金华士人对于蒙古统治的观点属于后者,他们认为(如戴良)在蒙古统治的条件下,需要出仕,以保存传统文化和改造元政权,使其符合士人的政治理想(*Jin-hua Confucianism under the Mongols* (1279-1368), pp. 144~151)。

② 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有:Jennifer W. Jay. *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ism in the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y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1. p. 7. 方勇:《元代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陈得芝:《元初江南士人的政治动向》,载《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2期,第147~159页;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载《元史论丛》第7辑,第1~19页。

③ 程敏政:《宋遗民录》卷十一,马廷鸾《书汪水云诗后》,知不足斋丛书第8册,中华书局1999年,第647页。

④ 佚名:《崖山集》,《杂录》,吴澄《吴文正公集·跋文公封事》,涵芬楼秘籍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387页。

⑤ 林景熙:《霁山先生集》卷一《哭郭同舍(宜孙)》,知不足斋丛书第9册,第218页。

每谈经济事，恒及离乱间。言辞多慷慨，文字少凋残。不叹东逝川，但忆南山田。宁与无心游，不受众目怜。^①

在元代江南士人的诗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回忆宋元战争的记载，刘壎记载了他与宋建宁府节度推官邓德秀（字元实，南丰人）在宋元战争期间的交往：

丙子（至元十三年，1276）兵交，大势未一，有仗名义图兴复者，君与其谋，军声震邻。君语予曰：“一兴复即一糜烂，奈何？”予不敢应。居数日，益震且逼。君笼灯夜叩吾门决策，予曰：“兴复义也，抑乌合非素练，势必扰，盍少避乎？”君曰：“然”。俱散避，已，乃果扰且溃败。明年复见君，相对唏嘘而已。^②

上述事例，记载的是宋元战争期间一些宋朝官员伤感往事。虽然事件中的主人公临阵脱逃，但后来的江南士人对他们只有伤感与同情，没有怨恨，怀旧情结已经掩盖了大义殉国的悲壮情怀。这说明宋朝灭亡相当一段时间，南宋末年的往事一直是当时江南士人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些往事是元代江南士人永远忘不掉的忧伤记忆，尽管他们不忍回忆它，但士人们聚会时，又自然而然地涉及到它。

其次，品评南宋时代的历史人物，也是元初江南士人平时谈论较多的话题。宋末的一些关键人物如文天祥、贾似道等人，经常成为士人们议论的中心。

元末王祹记载他儿时就读过文天祥的《吟啸集》和《北行日历》，后来还读了文天祥的《本传》，在吴县又看到了文天祥的画像^③，说明文天祥的事迹确实在整个元代被广泛谈论。除了文天祥的诗文、事迹在元朝广泛流传以外，文天祥的遗物以及书法、诗作也成为元人收集的对象，这同样是江南士人怀旧情结的直接反应。如吉安士人张宏毅（别号千载心）：

江南既内属，公自广还，过吉州城下，先生求见，曰：“今日丞相赴北，某当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囚所侧近，日以美饌饷，凡三载，始终如一。且潜制一桮，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复访求公之室欧阳氏于俘虏中，俾出，焚其尸，先生收拾骸骨，裹以重囊，与先所函桮南归，赴公家葬之。^④

南宋灭亡不久，安福士人王炎午（太学生，入文天祥幕府，后以母老辞）写了《生祭丞相文》，“既历陈其可死之义，又反复古今所以死节之道，激昂奋发，累千五百余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国，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读其文，稍无苟活之心，不即伏剑，必自刭于沟渌。”安成士人王应凤（字尧举，宋进士，授建康军判签）“读之流涕，相与誊录数十本，自赣（赣州）至洪（今南昌），于驿途、水铺山墙店壁贴之，冀丞相经从一见，虽不自揣量，亦求不负此心耳。”^⑤

元朝统一之初，文天祥被江南士人“生祭”，其祭文被广泛张贴在驿站水铺的墙壁上，说明了这一时期江南士人对文天祥的密切关注。另外，文天祥的书法、诗文同样受到珍视，周密记载了元人珍视文天祥书法的故事：

平江赵升卿之侄总管号中山者云：近有亲朋过河间府，因憩道傍，烧饼主人延入其家，内有小低阁，壁贴四诗，乃文宋瑞笔也。漫云：“此字写得也好，以两贯钞换两幅与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家传宝也，虽一铤钞一幅亦不可博，咱们祖上亦是宋氏，流落在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岂可轻易把与人邪？文丞相前年过此，与我写的，真是宝物也。”^⑥

以上论述，反映了元代江南士人对文天祥及其亲属的关注，这种关注既包括对南宋亡国的惋惜与忧伤，也包括对忠臣爱国的敬意，其实是一种怀旧情结。

与文天祥对比，南宋丞相贾似道作为蠹国害民的典型，也是元初江南士人谈论的重点。元平江南，

① 揭傒斯：《揭傒斯全集》卷二《春暮闲居寄城西程汉翁十五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9页。

② 刘壎：《水云村稿》卷八《建宁推官邓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③ 王祹：《王忠文公文集》卷十一《文丞相画像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8册，第197页。

④ 程敏政：《宋遗民录》卷七，陶宗仪《张毅父遗事》，知不足斋丛书第8册，第622页。

⑤ 程敏政：《宋遗民录》卷一，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前序）》，知不足斋丛书第8册，第577页。

⑥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文山书为北人所重》，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第5818页。

有士人到元丞相伯颜军前,力诉贾似道蠹国害民^①,南宋灭亡以后,贾似道成为江南士人评价南宋灭亡原因时的重要人物。元人揭傒斯在总结南宋灭亡原因时,写道:

宋南渡不能复振者,本于张浚抑李刚,杀曲端,引秦桧杀岳飞父子,而终于贾似道之专、刘整之叛。……虽曰天数,盖亦人谋之不臧。为一世计,则中国之臣误国之罪也;为万世防,则中国之人助夷之罪也。^②

揭傒斯在这里说的“中国之臣误国”,自然包括贾似道。不过,虽然江南士人对贾似道导致宋朝灭亡颇有微词,然而毕竟事情已成过去,江南士人在回忆起贾似道时,同样表现出惆怅、哀怨之情。元人蒋正子记载:

贾秋壑败师亡国后,有人刺以诗曰:深院无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辉煌。只知事去身宜去,岂料家亡国亦亡。理考发身端自有,郑人应梦果何祥,卧龙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满画墙。^③

从以上所述元人对文天祥和贾似道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元初江南士人对南宋历史人物的关注和怀念。此外,除了文天祥、贾似道这样的重要人物,与南宋灭亡往事关系密切的一般人物,同样也是江南士人经常谈论的话题。瞿佑谈到南宋末年祈请使者之一家铉翁的情况:

元兵南下,次高亭,宋朝纳降。吴坚为左相,家铉翁为参政,与贾余庆、刘岩为祈请使北行……至北,铉翁抗节不屈,拘留河间。世祖崩,成宗继位,始赐衣服,遣还乡里,年逾八十也。^④

家铉翁作为南宋灭亡的见证人,自然被江南士人关注。除了日常的谈论和回忆历史人物以外,元代江南儒士还广泛收集宋代人物的事迹,编成图书,以资流传。江南士人杜本,“集亡宋节士之诗,为《谷音》二卷,惜世罕传。”^⑤

不过,江南士人在回忆南宋时,并不总是忧伤和哀痛,他们也会对宋朝时期的社会风气、宋朝太学的繁荣、宋朝科举的繁盛等进行夸张的描述,并对此感到自豪,这种快乐的记忆,同样是一种怀旧的表现。刘诜描写了南宋时的儒风之盛:“惟异时旧家相望,乔木连云,弦诵之颀颀,衣冠之还往,何其盛也!时运乘除,而畴昔会合之乐,殆不可数。”^⑥刘壘对南宋时代南丰的儒风描写更加典型:

吾丰(南丰县)素称文献邦,往昔无论城阙里巷,东阡西陌,伊吾声常相属,化美成俗,概以不儒为耻。故虽粟连廩,金盈匱,昂昂峙闾右,然而诵弦不接于其邻,章缝不踵于其门,即清议卑鄙之,曰:“何物俗子也”,率见摈于卿士大夫。由是负资力知愧赧者,争自愤厉,涤濯粉泽缘饰,冀以免“守钱奴”、“多牛翁”之讥,而曰:“吾士矣”。抑犹有狙服窜名,姑惟诳愚,掩盖而实不学,即清议复卑鄙之,资以为笑。^⑦

这种重儒、习儒的社会风气,与元代士人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江南士人的美好记忆。陆文圭通过宋元太学景象的对比,盛赞南宋太学的盛况,并对元代太学的荒废表示不满:

杭故都也,三学盛时,江淮、湖浙、闽、蜀之珍萃焉。桥门冠带,动以万计,名未登三学者,待次于杭,谓之天府之学,升进之阶,视列郡为优。校官选第一流,非进士前列不预考,未终旋入馆阁。故当时之士贵以肆,其得也,身持风裁,口吐清议,上攻帝躬,次及宰辅……气运衰竭,崇极而圯,三学之地,废为官署,鞠为园蔬,过而问者莫知其处……游士散归,土著居民习为吏商,廊舍悄然,不闻弦诵。华发台背之老,或三五人持钵传餐,使柳子厚见之,必不能仰视其徒。而三十年来校官之选,称职者寡,则亦无怪其徒矣。呜呼!任是责者,谁欤?^⑧

刘将孙则是通过驳斥轻视士人的言论,记述了宋朝科举之盛况,并对元朝不重视人才进行批评:

客之言曰:“日吾党士之东下者,舟相望,所可知者,已百许人,何如其多也!毋亦使人厌且

①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六《朱氏族谱传序》,四部丛刊续编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5页。

②佚名:《崖山集》,《杂录》,涵芬楼秘籍第4册,第387页。

③蒋子正:《山房随笔》,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第6546页。

④瞿佑:《归田诗话》卷中《家铉翁持节》,知不足斋丛书第1册,第739页。

⑤都穆:《南濠诗话》,知不足斋丛书第1册,第764页。

⑥刘诜:《桂隐文集》卷三《与杨西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刘壘:《水云村稿》卷八《贡补进士王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六《送焦君实杭州学正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4页。

贱之邪？”余叹曰：“异哉！子之以是为已多也，往年场屋终场动万计，乡漕凡十八九等，临轩亲策诸科南廊，赐袍笏，浮千百。岂其太平一统，事事超古昔上，而独士之盛乃不及偏方时？”^①

上述记载，包括了作者对宋朝繁盛的回忆和对元朝士人尴尬处境的不满。不论是南丰的士风还是南宋的太学、科举的繁盛，都与士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既然在江南士人的语境里，宋元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别，江南士人对宋朝的怀念和对自身处境的不满，非常清晰地表现出来。这说明了怀旧与现实处境之间的关系。

二、同情与愤怒：元代江南士人对先贤后裔的关注和对社会现实的批评

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还通过他们对南宋名人世家后代的关注、对元代现实的批评以及对儒学未来发展的担忧表现出来。对过去人物的回忆，自然要关注到南宋先贤后人的情况，对过去的怀念也总是伴随着对当今社会的批评，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对传统文化——儒学未来的忧虑，这是元代江南士人怀旧情结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南宋名人世家的处境，与元代江南士人的历史记忆密切相关，因而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其中，南宋世家的破败，成为元代江南士人精神世界中十分痛心的内容。吴澄在谈及元代江西地区前朝世家的情况时写道：“异代高门巨室，失其固常，无所控倚，身殒家圯，类十八九。”^②

这些前朝大家的衰落，很容易让江南士人回想起宋代他们家族的繁荣兴旺，勾起他们对宋朝幸福生活的历史记忆，因此成为他们语境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话题。程钜夫记载了五世聚族而居的青田陆象山（南宋学者，陆学创始人，南宋与朱熹齐名）家族在元代衰落的情况：

（陆氏之家）毁于邻寇，火三日不灭。凡异时遥瞻仰指，敬叹不容口者，一旦如云收气散，莫可追摹……子孙或徙或亡，其犹环居故址者，饥寒颠沛，不能皆贤，象山之基几易姓矣！^③

黄潛记载了宋朝名臣宗泽后人的情况：

宗公泽，宋元祐进士。靖康时，守磁州，高宗以亲王北使，过磁，公力止之……公以京城留守殁于汴，谥曰：“忠简”。县人至今奉公与颜君合祠于学官，号其堂曰“忠孝”云。夫以数万家之邑，上下几二千年，乃得此两人。其子孙或不克大振，或已泯绝无闻。^④

上述几例，反映了元代江南士人对在宋朝时期文化、政治、军事方面著名家族的关注与怀念。此外，对于江南士人来说，他们对宋朝时经常一起唱酬的一般儒士同样比较怀念，往日那些如同梦幻般的幸福生活经常出现在他们的回忆中，对于这些再也不能重现的良辰美景，他们表示忧伤和感慨。儒士林景熙则记述了江西儒士衰落的情况：

“予客江西十年，访旧游，半入地，幸而存者，或逃山林，或淹党逐，或老，或贫。庐陵刘会孟，执斯文牛耳盟，俄复溘然于人世，何速也！”语已，各唏嘘。^⑤

上面的事例说明了宋元社会变迁对江南士人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作为已经衰落的江南士人群体的一员，他们对这种情况感到感慨和悲痛，对宋朝的历史记忆则是更加珍惜和怀念。元代江南士人感到忧伤或叹息的是文献故家和士人家族的衰落，因为他们是“以诗书之泽，德义之旧，栽培涵煦于数百年之久”的结果，而元代兴起的那些“突起”之家，轻而易举地就成为元代乡间新贵，这种情况令江南士人愤慨和不平。从史料来看，元代江南士人对于沦落的前朝世家子弟，仍然十分敬重，刻意照顾他们的生活。安成士人奔清甫，习医致富，他“见故家子弟羈孤沦落，彷徨无所归，或馆之，或食之，曰：‘此名家之子也。’人以横逆相加，未尝难焉。”^⑥信州儒士朱蕃（字蕃远）讲学乡里，“陆文安公讲学象山，祠宇湮没，白之郡

① 刘将孙：《养吾斋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吴澄：《将仕郎师叔墓志铭》，载《吴文正集》卷三十六，第15页，台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成化二十年刊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③ 程钜夫：《雪楼集》卷十四《送陆如山归青田创先贤祠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黄潛：《黄潛全集》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1页。

⑤ 林景熙：《霁山先生集》卷五，知不足斋丛书第9册，第247页。

⑥ 揭傒斯：《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91页。

守秦公从龙,复构祠堂,行舍菜礼,数郡诸生毕至。陆氏元孙止一人而无后,先生访其人,为之娶妇。”^①这种照顾世家子弟的事例还有很多。元代江南士人对南宋世家子弟的尊敬和照顾,实际上还是怀念南宋时期士人的地位和荣耀,是其怀旧情结使然。

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还表现在他们对元代社会现实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士人批评元代社会现实,是以南宋时期的价值观作为参照系的。元代江南士人批评社会现实主要集中在元代的政治风气、社会风气以及元代的士风。

对于元代的政治风气,江南士人主要批评元朝统治者贪污腐败,不重视儒治。元人吴澄在至顺元年(1330)写道:“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②徐明善则是通过宋元官场的对比,批评元朝官场习气,通过其乡义役在元朝的遭遇,批评了元朝的统治方式^③。很明显,他是在以宋朝的价值观批评元朝,怀旧情绪明显地表现出来。

元代江南士人批评元代的社會风气,主要从元代儒士受到排挤导致斯文丧尽的方面进行。陆文圭则对“儒道益轻”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评:

宋暮年儒风骤盛,荒邑小聚,犹数十家书声相闻。科场既罢,士各散去,经师老宿,槁死山林,后生晚进,靡所矜式。冒然进取者,又阔远于事情,类为操刀笔者所讪侮。有中人之产,则役使之,困辱之,产不尽不止,以故儒道益轻。^④

这里,陆文圭在批评社会现实时,首先回忆了南宋的情况,通过对比说明“儒道益轻”的现象。针对元朝的士风,元代江南士人同样很不满意,很多人都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元代江南士人首先批评士人中的奔竞之习。元代士人入仕困难,很多人成为游士,通过巴结权贵,得到任命。这些求仕的士人往往不是靠真才实学得到职务,这一点引起江南士人的不满。刘壎写道:“(南)丰之自邑升州也,奔竞成习,往往挟资取名,迂视儒术。”^⑤陶宗仪记述了士人杜本被元朝召见之前,士人纷纷投拜到他门下的闹剧:

杜清碧先生本应召,次钱唐,诸儒者争趋其门,燕孟初作诗嘲之,有“紫藤帽子高丽靴,处士门前当怯薛”之句,闻者传以为笑。^⑥

其次,江南士人批评元代士人中间的不重气节、文风卑下以及见利忘义的庸俗之风。陶宗仪认为:“世道不古久矣,朝为师生而暮若途人者,比比皆是。”^⑦刘壎也写道:“大元革命初,兵祸频仍,士学都废,往往易节。”^⑧刘诩批评了元朝士人的庸俗之气:

予念斯文之在天地间,非尽无清淑之气,然贫贱奔走,往往汨没而失之;而富贵之士,又沉酣于声色势利不能自拔。处华屋奥室,重帘累幕之下,而悠然遐思山间明月者,几何人哉?^⑨

上述对元代士风的批评,实际上是元代江南士人对现实不满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士人在批评元代士风时,往往并不分析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社会原因,而是以固有的关于士风的观念,批评现在与以前不同的方面,其实他们还是把其理想的宋代士风,作为标准来评价元朝,这当然会得出消极的结论。不过,对于这种社会现实,江南士人也无能为力,只能长叹而已。

元代江南士人对政治、社会和儒风的不满,势必产生对未来前途的忧虑,这种对未来的忧虑和对过去的怀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戴表元在一篇文章中则直接表达了对传统儒学前途的恐惧:

余初学儒时,见世之慕利达者,宗科举;科举初罢,慕名高者宗隐逸。隐逸之视科举有间也,当是时,犹各有大儒遗老有名实者为之宗,学者赖以不散。岁月推迁,心志变化,昔之为宗

①危素:《危太朴集》卷七,台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刘氏嘉业堂刊本,第26页。

②吴澄:《吴文正集》卷十四,第13页。

③徐明善:《芳谷集》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二,第1页。

⑤刘壎:《水云村稿》卷八。

⑥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第346页。

⑦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六,第71页。

⑧刘壎:《水云村稿》卷一。

⑨刘诩:《桂隐文集》卷一。

者且将销铄就尽，而士渐不知其宗，吾为吾道吾类惧焉！^①

戴表元的这种对元代儒学、儒士前景的担忧，反映了具有怀旧情结的江南士人，对未来的消极态度。

三、特立独行：元代江南士人对梦想的坚持与对现实的逃避

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还从他们对往日梦想的坚持与对现实的逃避中表现出来。这些经历过宋元社会变迁的江南士人，已经不能抹去他们在前朝的历史记忆，他们对梦想的坚持方式则是以特立独行的方式，表示自己的独特性并以此逃避现实。

元初生活在对往事回忆之中的士人很多，他们用诗文表示对过去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满。如余姚士人叶某，“既依依然无所售其技，重山密林，穷居而独游余四十年。凡古今事会人物，至于卉木鱼虫之细，目触而心接，一发于诗。故老往往不忍读，后生闻之漫不省为何等语，宜其莫知所以称先生也。”^②

元代怀旧江南士人的日常行为，有一些不同于一般士人的特点。首先，对于共同经历宋朝灭亡事变的人，他们表现出特别的亲近，视为同志。睦州士人孙潼发（字帝锡，一字君文，号盘峰）的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现象。黄潛记载：

未几国破而家亦毁，先生避地万山中，草栖露宿，若与世隔。久之乃归，而稍复其故宇，为终焉之计……与乡先生袁公易、魏公新之为三友，袁、魏云亡，先生倚孤孑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适，咄咄书空而已。家公（指家铉翁）当运祚之垂绝，以使事如京师，久留河间，先生数致书候安否，既得归，年已八十。先生徒步往见之，握手道旧故，辄相对唏嘘泣下。^③

其次，对于降元的宋朝官员、仕元的一般士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可以理解，另外一些人则表示鄙视，不与交流。上面列举的孙潼发与方回的关系就是如此：

前郡守方公回，既奉版图上于职方，复以总管兼府尹终更，犹留居久乃去。前后十有二年，先生不一造其门。^④

因为方回投降元朝，又做了元朝的建德路总管，孙潼发十二年不与其交流，反映了他对降元、仕元士人的蔑视。

元代江南士人对降元者的这种态度，说明了他们还在为过去的往事耿耿于怀，这应该是怀旧情结的一种表现。

第三，元代怀旧江南士人的日常行为中，还有一些怪异的特征。如杭州士人吾衍（字子行）“高不仕之节，其所厌弃者或请谒，从楼上遥谓曰：‘吾出有间矣’，顾弹琴、吹洞箫、抚弄如意不辍”。^⑤婺源胡默之，“跌宕不羁奇士也，或夜半燃松明登山听泉，或祁寒著屐临溪上玩雪，少不如意，辄求去，人指以为怪诞。”^⑥

除了这些怀旧江南士人的个人行为表现怪异以外，有时他们还联合起来，做一些怪异的事情。邓牧记载：

岁丙申（元贞二年，1297）三月三日，陈用宾、刘邦瑞、胡汲古与余举修禊故事，会于镜湖，（祭晋右将军王公）……礼竟，主僧持酒出觞客，客亦反觞焉。问姓名，不告以出。循柳荫，复饮春波桥上，欢甚。有浩歌者，有瞪目视太虚者，有连举大白不置者，浮船自禹庙返，出桥下，仰见咸惊，以为异人。间有起复坐，喧笑亦不暇恤，或感慨言曰：乐哉此会，岂减永和时乎？……四人相顾而笑，相携扶而下，分流觞曲水韵赋诗舟中。^⑦

元代江南士人的这些怪异行为，既有对往日地位和荣耀的坚持与怀念，又有对当时社会的反抗。宋

①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十四，第222页。

②黄潛：《黄潛全集》第229页，王珽点校本。

③黄潛：《黄潛全集》第720页。

④黄潛：《黄潛全集》第720页。有关方回降元以后的事迹，台湾学者孙可宽先生进行过精细的考证，见孙可宽《癸辛杂识记方回事疏证》，《蒙古汉军与汉文化研究》第107—132页，台湾文星书店1958年10月。

⑤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六，第76页。

⑥程黼南：《洪府君味卿墓志铭》，《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九，第2189页。

⑦邓牧：《伯牙琴》，知不足斋丛书第4册，第396页。

朝时代对于他们来说,象征着地位与荣耀,宋元的改朝换代使他们失去了昔日的一切,在他们怪异的外表之下,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往事的怀念和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反抗。

四、结 论

怀旧情结是元初江南士人精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宋元王朝的更替,使江南士人群体受到较大的打击,元朝异于汉族传统王朝的统治方式,使元代的士人由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文化精英,转变为寄存于官学教育系统的一般儒户,出仕之路基本断绝,这种情况导致了江南士人群体的衰落,江南士人必须重新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这种情况下,怀旧成为江南士人精神世界的主题。

元初江南士人的怀旧,首先是追述宋朝的历史记忆,怀念宋朝的历史人物,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大多是忧伤的。由于宋朝先贤涉及到江南儒士的历史记忆,他们对元代先贤后人的处境非常关注,一些人热心于照顾南宋先贤子孙的生活。怀旧同时也与对现实的批评相伴出现,元代江南士人对现实的政治风气、社会风气和士风都进行批评,批评的重点是元朝统治导致的士人社会地位下降和处境恶化。

由于怀旧,元代江南士人对宋朝时期的历史人物态度分明,那些南宋的忠臣,受到士人们的推崇,而那些投降的南宋官员和仕元的一般士人,则受到冷落和嘲弄。

元代怀旧的江南士人主要是经历过宋元更替的前宋官员、进士和一般士人,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是宋朝遗民,在政治上反对元朝。大部分人只是对元代士人的处境和地位不满,并不反对元朝统治,有的人还在元朝做了学官或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官员。怀念宋朝时期的统治方式和历史人物,是这些怀旧士人的共同特点。有趣的是,不光是江南儒士怀旧情结浓厚,那些在江南做官的北方士人,也受到其怀旧情结的感染,元人郑元祐记载了一个怀旧士人邓某(号山房)与元代江南名宦的交往事迹,因为邓某能言“宋季遗事”,而得到元代江南监察官员胡祗遹、雷膺、阎复和徐琰的青睐,一起唱酬诗文,稽经考史^①,说明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对元代江南地方官员的影响。元代江南士人的大量怀旧言论,对于元朝江南地方政府改良统治方法,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或舆论导向,对元朝江南统治的完善以及江南文化发展、教化推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实际上是对南宋时期士人的社会尊严以及南宋政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统治方式的怀念,这些正是元朝蒙古统治所忽略和欠缺的内容。社会群体的怀旧情结其实也是对社会个体的尊严和社会公平的呼唤与诉求,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作者简介:申万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7FZS001)

●责任编辑:桂 莉



^①郑元祐:《侨吴集》卷八,第 19 页。